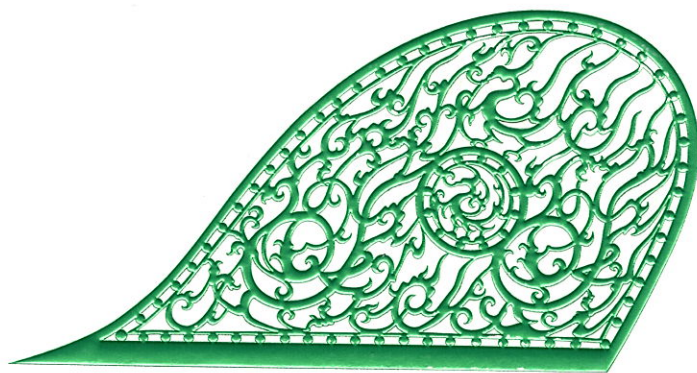


东方学刊

20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主办  
穆宏燕 \*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东方学刊

— — — — —  
2015  
—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穆宏燕\*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学刊. 2015 / 穆宏燕主编 — 郑州: 河南大  
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49-2212-2

I. ①东… II. ①穆… III. ①东方学刊—丛书 IV. ①K107.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1494号

书 名 东方学刊·2015  
主 编 穆宏燕  
责任编辑 刘淑颖  
封面设计 周伟伟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74千字 定 价 5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天  
唐代  
《一  
中国  
两种

中国

波斯

从波

西班

《后列

构筑

## 目 录

### 异文化互动与跨文化研究

- 《天下》杂志与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 ..... 张西平 / 3
- 唐代傀儡戏东传以及日本傀儡戏的形成 ..... 邱雅芬 / 23
- 《一百零一夜》与中国 ..... 邴溥浩 / 34
- 中国犹太人的儒化：开封石碑碑文释解 ..... [美] 浦安迪 著 钟志清 译 / 43
- 两种耻文化
- 俄狄浦斯与田村卡夫卡人物形象分析 ..... 唐卉 / 55
- 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
- 基于第 11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问卷和访谈 ..... 吴杰伟 霍然 / 72
- 波斯艺术家在印度莫卧儿：影响与转型
- [美] 普里希纳·P. 索切克 著 穆宏燕 译 / 84
- 从波斯到欧洲：“中国公主”故事传播的另一个维度
- 俞雨森 [伊朗] 法尔扬内·法达埃勒斯克提 / 102
- 西班牙—阿拉伯俚谣的语言与功能 ..... [美] 阿布·海达尔 著 宗笑飞 译 / 115
- 《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导论
- 关于殖民地、食人族和本土语言
- [英] 苏珊·巴斯奈特 [印度] 哈里什·特里维地 著 张远 译 / 127

### 跨国资本主义的东方遭遇

#### 构筑“死”与“再生”的神话世界

- 大江健三郎《诗集〈形见之歌〉二篇》论 ..... 霍士富 / 145

-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金明淑 / 171
- 伊拉克诗人白雅帖诗歌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 以《来与不来的人》为例..... 余玉萍 / 184
- 《神秘主义者的圣歌》：移居中的守望
- 早期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母题研究..... 马征 / 197
- 伊朗当代战争文学一瞥..... 于桂丽 / 212
- 从妇女着装问题看伊朗现代女性运动的困境..... 姜楠 / 224

### 古代文化与经典研究

- 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发现与刊布..... [英] 约翰·布腊夫 著 常蕾 译 / 239

### 学科分析与研究

- 新中国东亚文学整体综合研究的考察..... 黎跃进 / 249
- 21 世纪东方文化论坛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 259

### 张鸿年先生纪念特辑

#### 岔道里的胜景

- 记波斯语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先生..... 穆宏燕 / 269
- 张鸿年教授获“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学术研究贡献奖”
-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 280
- 悼念张鸿年先生..... 陈岗龙 北京大学蒙古语专业教师 / 281
- 深深怀念张鸿年老师..... 邢秉顺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57 级学生 / 283
- 忆鸿年学长..... 华黎明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58 级学生 / 284
- 怀念张先生..... 宋丕方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58 级学生 / 288

怀念张鸿年老师...张晖(在校时名张孝先)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58 级学生	/ 290
寄往天国的一封信		
——悼念张鸿年先生.....	蒋樾初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60 级学生	/ 303
半个世纪先生情.....	李玉琦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63 级学生	/ 309
布衣书生的楷模		
——怀念张鸿年老师.....	滕慧珠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71 级学生	/ 313
平凡而伟大.....	朱彦彬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71 级学生	/ 316
我心目中的张鸿年老师.....	李东林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75 年进修生	/ 317
怀念师恩		
——追忆张鸿年教授.....	王一丹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82 级学生	/ 320
怀念先师.....	穆宏燕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82 级学生	/ 323
纪念张鸿年先生.....	程彤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87 级学生	/ 328
低调的大师 慈爱的长者		
——怀念恩师张鸿年教授.....	刘慧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91 级学生	/ 330
电话那边的张老师.....	时光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96 级学生	/ 332
一个后学晚辈记忆中的张鸿年先生	刘英军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1996 级学生	/ 334
纪念张鸿年老师.....	沈一鸣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2000 级学生	/ 337
记永远的导师张鸿年.....	贾斐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2004 级学生	/ 340
怀念张鸿年老师.....	林喆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 2008 级学生	/ 342
张鸿年先生著述目录.....	穆宏燕 整理	/ 344
“我已把语言的种子播撒到大地上”		
——张鸿年教授访谈录.....	沈一鸣 整理	/ 347

## 《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导论\*

——关于殖民地、食人族和本土语言

[英]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印度] 哈里什·特里维地 (Harish Trivedi) 著

张远 译

### 1

从前，在今天巴西所在的地方，16世纪的时候，图宾南巴 (Tupinambà) 部落族人吃掉了一个天主教牧师。这一举动让整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之恐惧战栗，成为欧洲基督徒讳莫如深的事情。“食人族” (cannibal) 这个术语与美洲相连，原指安地列斯群岛 (Antilles) 的加勒比族人 (Caribs)。1796年它以“吃人肉者”的词被收于《牛津英语字典》(OED,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而最终进入英语词汇，并随后传入其他欧洲语言。这个部落的名字和对于吃人肉的野蛮人的称谓融合成了一个术语。

吃掉牧师在图宾南巴族人看来并非毫无逻辑，甚至可以说是表达敬意的举动。毕竟，一个人不会吃掉他不尊敬的人。在一些部落中，吃掉最强壮的敌人或最可敬的老者被认为能够获得在现实中使用的权力。这在欧洲也并非前所未闻；比如高贵的罗马寡妇波西亚 (Portia) 把丈夫的骨灰放进一杯红酒一饮而尽，说她的身体才是他最好的归宿。以及，图宾南巴族人毫无疑问一头雾水，因为这位牧师是来传教的，而基督教依赖于吞食基督 (救世主) 血肉这个象征。想要辩称圣餐中象征性的吞食与真实地咀嚼萨丁哈 (Sardinha) 神父的血肉并不相同，或者说图宾南巴部落吞食和禁忌的概念来自截然不同的源头，实在是没有什么说服力。

---

\* 译文来源: 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Introduction: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 in 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 editor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18.

这时我们可能会问，这个故事与翻译有什么关系？确实很有关系。不过在更充分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建立特定的前提。首先，翻译不会在真空中发生，而会在连续介质之中，这非常明显；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不间断的跨文化传递过程的一部分。其次，翻译是高度可控的活动，包括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传递过程中的各个层次。翻译不是单纯和透明的活动，而是在每个层次都充满重要意义；翻译极少（如果有的话）牵涉文本、作者或系统间的平等关系。

翻译研究的近期成果对译本较之原本（the original）更为低劣这个长期存在的观念提出质疑。在这一层面，翻译研究与其他文学和文化研究内部的激进运动遵循了相似的路径，质疑经典化政治，毅然与普适的文学的伟大性决裂。这不是要否认某些文本的价值高于其他文本，而仅仅是在于确信评价系统会依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非一以贯之。

任何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工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原本”（原始文本）或源本（the source）与这个原本的译本之间的关系。原本一度被认为在事实上（de facto）优于译本，译本则被降低到仅为副本（虽说是另一个语言的副本）的地位。然而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这种高位原本（high-status original）观念是比较新的现象。中世纪的作者或译者并未受到这个错觉的搅扰。高位原本产生于印刷术的发明和读写能力的普及，与作者是他/她作品的“拥有者”这一观念的出现相连。这样，如果出版者或作者拥有了文本，那么译者还能有什么权利呢？这一矛盾已被纳入我们对译本与所谓原本间关系的思考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这个概念的发明与早期殖民扩张同时出现。那时，欧洲为占领土地，将触角伸出了自己的边界。而今，优势原本的预设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其主要来源是环绕和护卫欧洲的篱笆和砖墙之外的可怕的食物地区。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断言，翻译是我们理解所居之世界的主要方式。他说，世界作为不断累积的一堆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

每个都与之前产生的那个稍有不同：译本的译本的译本。每个文本独一无二，却也同时是另一文本的译本。没有文本是绝对的原本，因为语言本身及其实质就已经是译本——最初译自非语言世界，进而每个符号和短



语都是另一符号和短语的译本。<sup>[1]</sup>

这个激进的翻译理念没有把翻译视为边缘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要活动。这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这些作家们的相关评述相一致。富恩特斯甚至还说“原创性（原始状态，originality）是一种疾病”，是永远企图把自己看成某个新鲜事物的现代性疾病。<sup>[2]</sup>公平地说，而今为数众多的拉丁美洲作家对翻译及作家/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均怀有强烈主张。为理解这个重心的转移，我们需要再次考察翻译史及其在殖民初期被利用的方式。

韦森特·拉斐尔（Vicente Rafael）描述了翻译对西班牙殖民者和菲律宾塔加拉（Tagalog）族人的不同意义：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翻译一直是一个将本土语言和文化弱化为神权和帝国入侵时唾手可得的客体和主体的问题。对于塔加拉族人来说，翻译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反复标注他们自己和西班牙人之间语言和兴趣的不同来逃脱西班牙人的完全控制，而不是将殖民基督教的习俗内在化。<sup>[3]</sup>

他精确描述了在殖民过程中翻译对于不同群体呈现的截然不同的含义。因为现在殖民主义和翻译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并驾齐驱。埃里克·谢菲茨（Eric Cheyfitz）辩称翻译是“欧洲殖民和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核心行为”<sup>[4]</sup>。特贾斯维尼·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进一步指出，翻译形成和成形于“殖民主义权力运行的非对称关系之中”<sup>[5]</sup>。玛琳琦（La Malinche）这个印第安女人是征服者哈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劫掠的情人，也是西班牙人和阿芝特克人

[1] O.Paz, trans. Irene del Corral, "Transl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letters", in R. Schulte and J.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54.

[2] C.Fuentes, *Aura*,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90, p. 70.

[3] V.Rafael,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3.

[4] E.Cheyfitz,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4.

[5] T.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2.

(Aztec) 之间的翻译, 她的形象作为一个标志, 提醒我们殖民主义的重要隐喻是强暴、占有“处女地”、耕种和浇灌并最终“教化”她们。<sup>[1]</sup> 因此在这个后殖民时期, 正如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所说, 当帝国开始反扑, 激进的翻译理念在印度、拉丁美洲、加拿大、爱尔兰——简言之, 在全世界曾经的殖民地——出现并挑战欧洲业已确立的关于翻译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规范, 这并不令人吃惊。

让我们在这个节点回到食人行为。图宾南巴族人吃掉了他们的牧师;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一些巴西作家回溯到这个故事, 以期重新思考他们自己 (作为拉丁美洲人) 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因为欧洲被视为伟大的原本 (great Original) 和起始点, 而殖民地则是欧洲的副本或“译本”, 其职责在于复制。而且作为副本的翻译被认为比原本低劣, 因此这个把翻译看作对更伟大原本的消解的神话随之产生。还应该牢记“缺失”这个用于众多翻译评论中的特性鲜明的词汇。例如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主张“诗性会在翻译中缺失”。翻译的初学者几乎全部从这样的预设出发: 某些东西会在翻译中缺失, 而且文本会被消减得更为低劣。他们罕有想到翻译可能也是一个获得的过程。认为殖民地是伟大欧洲原本的副本或译本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涵盖了这样一个价值评判, 即把翻译列于文学等级中的低等地位。殖民地由于这样的定义而较之殖民者 (殖民地的原本) 更为低劣。

那么从殖民主义产生的殖民地如何面对这个两难的困境? 他们如何找到一个方式来维护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文化, 来抵制“副本”或“译本”的头衔, 同时又不至于摒弃所有 (来自欧洲的可能是有价值的东西)?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 (Oswald de Andrade) 的《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 1928) 出版于被食人族吃掉的萨丁哈神父遇害 374 年之后。书中提出以食人主义隐喻作为传递巴西文化的方式。被殖民者只有通过吞食欧洲才能真正摆脱那些强加给他们的东西。与此同时, 这个吞食行为既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欧洲法典的违抗, 又可以是表达敬意的举动。

食人主义隐喻开始用于向译者证明他们能如何对待文本。伟大的巴西翻

[1] P.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译家哈罗德·德·坎波斯 (Haraldo de Campos) 的作品在埃尔斯·维埃拉 (Else Vieira) 的文章中被详细探讨。<sup>[1]</sup> 德·坎波斯说, 翻译可以被比喻为输血, 其重点在于译者的健康和给养。这与忠实原本、将译者视为源文本的奴仆的观念相去甚远。据德·坎波斯所说, 翻译是一种对话, 而译者不仅是一个全能的读者, 还是一个与作者相当的自由代理人。这是与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所描述的翻译包含对源文本的“入侵”<sup>[2]</sup> 截然不同的翻译理念。

现在, 后殖民理论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翻译, 重新占领并再度评价这个术语。当我们仔细审视殖民和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 我们可以察觉几个世纪以来翻译的单向流动到达了何等程度。文本被译入欧洲语言供欧洲人消费, 而不是作为互惠交流的一部分。欧洲规范统治文学作品, 并且这些规范确保只有特定种类的文本, 也就是那些将被证明对于接收方文化来说不是异类的文本, 才会被译出。如阿努拉塔·丁瓦尼 (Anuradha Dingwaney) 和卡萝·梅尔 (Carol Maier) 指出, 翻译时常是一种暴力形式。<sup>[3]</sup> 此外, 如今翻译在促进殖民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样明显。殖民地只是位于地图别处的译本或原本副本的隐喻也得到承认。

这个正在被揭露的翻译的不光彩历史引来一些极端反应。有些人坚持认为应该限制甚至削减以欧洲语言为目标语言的翻译。他们主张文本不应被译入占据优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体系, 因为这样会延续殖民化进程。毫无疑问他们说得有理。然而限制翻译就会踩进其他形式审查制度的红线。翻译禁令可能与专制政权焚毁不受欢迎的书籍异曲同工。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等作家和众多加拿大女性翻译家提出的方法更富有成效。后者在谢莉·西蒙 (Sherry Simon) 的文章中论及。<sup>[4]</sup> 她们极具说服力地为新中间存在者 (in-betweenness) 政治辩护, 为重新评价阈限空间的创造性潜力辩护。如霍米巴巴所说:

我们应该牢记, 正是这个“间”(inter)——翻译和协商的刀锋, 存在于中间的空间 (in-between space)——承载着文化意义的重担。它使正视

[1] S.Bassnett and H.Trivedi(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95-113.

[2] G.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A.Dingwaney and C.Maier (eds.),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 Pittsburgh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5.

[4] S.Bassnett and H.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58-74.

民族的反民族主义的属于“人民”的历史成为可能。通过探索这个第三空间 (Third Space), 我们可以避免两极对立政治, 并以我们自己的他者的身份出现。<sup>[1]</sup>

本文提及的论著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翻译行为永远比语言本身涵盖的内容要多得多。翻译永远植根于文化、政治和历史的体系之中。长久以来翻译被视为纯粹的审美活动, 其意识形态的问题则被置之不顾。而译者使用的策略反映出文本产生的语境。19世纪时英语翻译传统得到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或印度语言的文本被删减、编辑并附入大量人类学注释刊印。以这种方式, 独立文本及最初诞生这个文本的文化的从属地位通过特定的文本实践被确立。爱德华·莱恩 (Edward Lane) 在他家喻户晓的译著《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的注释中知会读者, 阿拉伯人比受过教育的欧洲读者更容易受骗, 而且无法像他们一样分清合乎情理和胡编乱造。<sup>[2]</sup> 同样, 19世纪最成功的译著之一《鲁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的作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指责波斯人在艺术上无法胜任, 并暗示说他们的诗只有被翻译成英语才能变成艺术。<sup>[3]</sup> 这两位译者都非常成功, 但是当我们开始审视他们的翻译实践所基于的前提, 就可以发现他们明显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一个更为优越的文化体系。翻译既是用其他语言涵括作者艺术成就的途径, 也是坚称欧洲文化优越性和统治地位的手段。

## 2

当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6) 将梵语浪漫戏剧《凭信物记起沙恭达罗》(*Abhijñānaśakuntalā*) 翻译成英语《沙恭达罗, 命中注定的指环:

[1] H.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38-39.

[2] E.Lane,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1859.

[3] S.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1, 引用 Edward Fitzgerald 在 1851 年 3 月 20 日给 Cowell 的信。

一部印度戏剧》(*Sacotala, or the Fatal Ring: An Indian Drama*, 1789), 他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他不时地阻止温柔的饱受相思煎熬的女主人公出汗。早在 1783 年他就移居加尔各答, 身份是最高法院法官, 他不会注意不到那里的气候明显比欧洲更暖和, 但是他还是感到为了他的西方审美趣味削减这种必要的肌体功能义不容辞。《爱经》(*Kāma Sūtra*) 在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和翻译, 所以他还不知道出汗作为可见的性趣和性兴奋的征兆在印度传统中被理解和欣赏(与英格兰不同, 那里一个人出汗是因为他“热, 生病, 恐惧或努力工作”<sup>[1]</sup>, 他也没有诉诸英语婉言, 当马挥汗如雨, 男人汗流浹背, 女人神采奕奕(while horses sweat and men perspire, women glow), 因为这个婉言很可能出现得更晚。总之, 他的古板行为和提前发作的维多利亚出版审查干脆利落地突显了常见的译者干预倾向: 抹去大量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细节, 就像对有怪味的东西消毒。

威廉·琼斯爵士一直被公认为“东方琼斯”(Oriental Jones)<sup>[2]</sup>, 带着前萨义德时代的纯真和崇敬。他是将印度(尤其是梵语)、阿拉伯和波斯作品译成英语的先驱, 引发了对东方文学的全新认识, 这种全新认识在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和最具创造力的欧洲思想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刺激以至于兴起了一场不亚于“东方文艺复兴”的运动——至少在当时看来如此。<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 一如几十年之后,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翻译交通依然是单向的, 即从东方到西方。然而, 贯穿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 即使从英语到印度语言的翻译开始常规化, 几乎与从英语译入数量相同的梵语作品被持续翻译成现代印度语言, 并且经常是出自同样一群使用多种语言、长着雅努斯面孔的印度译者之手。

贯穿这个时期, 印度文学空间是一个蓬勃的必争之地, 带着接纳新式西方文学的强烈冲动, 又与抗拒其影响的倾向形成合声, 常常通过重申更古老的印度本土的书写形态来实现。然而最终, 本土传统的再现让位给西方文学文化的霸权, 正如英国殖民统治在世界各地都发展得更为根深蒂固。新型文学生态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间十余种《鲁拜集》的印地语译本疾风

[1] *The Collins-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London: Collins, 1987, p. 1477.

[2] G.Cannon, *Oriental Jones: A Biography of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London, 1964.

[3] R.Schwab,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 1680-18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法文初版, 1950, 1984, pp. 4-8.

骤雨般地问世。当然，这些译本译自另外译本，确实是被翻译的东方主义的一个实例，甚至或许是前兆，也就是说，是帝国的逆向回译。这些译本当中有几种是大幅修改的印度改写本，还有几种是直接来自波斯语译出。波斯语在麦考莱和本廷克（Macaulay-Bentinck）于1835年勒令以英语取代它之前的若干世纪一度是印度精英阶层的官方语言，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如今依然精通波斯语。众多译自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鲁拜集》译本的印地语译本或许强调了殖民依赖性，因为印度人那时通过英语进入波斯文学，然而在同一时期直接译自波斯语的译本则可以被看作是对英语干涉的果断抵抗。《酒馆》（*Madhushala*, i.e. *The House of Wine*, 1935）是这些译本（或者说新的被启发的版本）中最成功的一部，出自20世纪最流行的印地语浪漫主义诗人哈里万沙·莱·伯金（Harivansha Rai Bachchan, 1907—）之手，将《鲁拜集》整体移植进当地文化，甚至是局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sup>[1]</sup>这样，如果海亚姆（Khayyam）和阿塔耳（Attar）这些波斯诗人需要被菲茨杰拉德补充“一点点技巧”之后方能在英语世界获得承认，菲茨杰拉德在变形成优秀印地语诗歌之前同样需要被非常彻底地改写，甚至是颠覆。

如果伯金的《酒馆》算作译本，那么翻译究竟是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述的改写（rewriting），还是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在印度文学语境下命名的“新的书写”（new writing）呢？<sup>[2]</sup>印度拥有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悠久历史。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早期虔诚（bhakti）或虔诚派诗歌的全部现代语言版本中，诗人屈服于神圣主题，并寻求将他的个体身份融入神圣主题。同一传统下诗歌的不同作者之间的区别，或是原创者和翻译者之间的区别，远不及在西方那样明显。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温柔得异乎寻常地这样恳求说，译者该对原本运行“爱”和“屈服”的程序，如她自己在翻译一些孟加拉语虔诚诗歌时所做的那样。当代小说家马哈思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也可以被看作坚持这些印度传统实践的残余力量。<sup>[3]</sup>与此相关，印度的书籍出版印刷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初具规模。查尔

[1] H.Trivedi, *Colonial Transaction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d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93], pp. 29-52.

[2] S.Mukherjee, "Translation as new writing", in S.Mukherjee, *Translation as Discovery and Other Essays on 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1994 [1981], pp. 77-85.

[3] G. C. Spivak,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G. C.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80-181.

斯·威尔金斯 (Charles Wilkins) 是一位早期东方学家和梵语翻译家。他设计和编码第一个孟加拉字体, 并于 1778 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一家印刷厂, 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大力资助。<sup>[1]</sup> 印度古版书实际即指 1801 年之前出版的书。印刷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兴起是这样一个现代殖民现象, 就像个体的、拥有版权的“作者”的诞生一样, 而这个作者的“死亡”和“行使职责”曾在西方引发了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争论。这样一位作者不再简单和沉默地被改写; 他需要的是审慎甚至忠实地被译出。

在梵语中用来表示翻译的词是 *anu-vad*, 在多数现代印度语言中也保留了 this 形式。这个词在语源学和最初的含义是“在之后说, 再次说, 用解释的方式重复, 解释性重复”, 通过佐证或插图反复说, 或对于之前已说的任何话的解释性引述<sup>[2]</sup>。这个词义的一个早期梵语用法出现在《广林奥义书》(*Bṛhadāraṇyaka Upaniṣad*) 中, T. S. 艾略特在《荒原》(*The Waste Land*) 的最后一节使用了其中的段落; 艾略特的“雷霆的话” (What the Thunder Said) 因其梵语源头, 严格来说应该是雷的翻译/重复 (What the Thunder Translated/Repeated) —— 因为 DA 这个音节已经被生主 (Prajapati) 率先说过。梵语 *anu-vad* 一词蕴含的潜在隐喻是暂时的, 意思是“在之后说, 再次说”, 而不是在英语/拉丁语中 *trans-lation* 一词的空间隐喻, 意为“穿过”。因此, 在新古典主义观念下的“模仿”在印度成为一种形式的翻译, 作为对某些已书写文本的重复, 以《罗摩衍那》(*Rāmāyana*) 和《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 这两部印度文化的源头巨著构成前殖民时期文学传统的主要产品。这两部巨著被无数作者用梵语和所有现代印度语言创作、再创, 各种重心和观念的转移在原始文本的空隙中被创造性嵌入, 沉默被阐释以辛辣的言辞, 甚至一些伟大的英雄变成了恶棍, 恶棍变成了英雄。

文学是积蓄力量不断求新, 其最为显著的例证就是这两部伟大史诗在几乎每种现代印度语言的通行版本。其中每个版本, 大致在 10 至 16 世纪间完成,

[1] J. L. Brockington, “Warren Hastings and Orientalism”, in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Papers from a Bicentenary Commemoration*, eds G. Carnall and C. Nichol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6.

[2] Sir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7 [1899], p. 38.

明显在总体上是基于梵语原本的重复或转述，但是它们又都具有足够的无可争辩的原创性以至于可以被任何人视为自发的、独立的、创造性的一流作品。例如杜尔西达斯 (Tulsi Das, 1532—1623) 因为 (改) 写了《罗摩衍那》(即《罗摩功行录》——译者注) 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印地语诗人。虽然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杜尔西达斯在印地语状态下所享用的自己的诗才，就如同在英语中莎士比亚和通行本《圣经》相加。

杜尔西达斯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就算他把这部经典史诗从梵语学者垄断性的监管中释放到“本土语言”的民众中来——可以预知这些梵语学者对他的嘲弄和困扰——他依然遵循宗教传统和种姓制度对他的规定，是一位完全的非暴力者和素食主义者。他改造《罗摩衍那》的改革性行为几乎不能算作巴西食人主义的例证；而是标志着一个有机的、分枝的植物生长和更新的自然过程，可能可以与古老的榕树在四周投下枝条、长出根茎、形成一个相互纠缠的树的群落这一过程相类比：有多少枝条就有多少树 (quot rami tot arbores)。这种原本与译本、传统与个人才性的共栖纠缠持续存在，并被视为对这个在当今印度普遍盛行的“翻创” (transcreation) 实践的认可。<sup>[1]</sup> 这个词确实被列入了《牛津高阶当代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第5版, 1996年) 新增补的“印度英语”词汇中，与 tota (鸚鵡) 和 trishul (三叉戟) 这些难解的外来词放在一处，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地球另一端，巴西的哈罗德·德·坎波斯曾独立使用“翻创”这个术语。<sup>[2]</sup>

加内什·德维 (Ganesh Devy)、伐那马勒·维什瓦那塔 (Vanamala Viswanatha) 和谢莉·西蒙曾撰文探讨在印度更早期的前殖民翻译实践的不同方面。<sup>[3]</sup> 前殖民翻译实践和后殖民时期翻译实践的一个决定性断裂是，现在，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自己，从各种印度语言译成英语的翻译都获得了一种霸权性优势。据一些前卫的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们的说法，在这一问题上，被充分共享的后殖民智慧即是帝国只能被回译成英语 (English)，或是回译成更低等或至少是英语小写字母

[1] P. Lal, *Transcreations: Seven Essays on the Art of Transcreation*, Calcutta: Writers' Workshop, 1996.

[2]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95-113.

[3]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58-74, 162-188.



的变种, english。<sup>[1]</sup>与之相对的主张称,文学,特别是后殖民介入的文学,与英语作品数量相当或更多地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成,尤其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大约占总人口的2%—10%不等)学过英语。常持怀疑论调的西方人对此的反驳是:但是证明给我们看啊——用英译!<sup>[2]</sup>在印度这样根深蒂固的多语言国家里,不仅当代文学作品大多以本土语言写成,而且绝大多数译本都是从一种印度语言译成其他印度语言。1996年,当马哈思维塔·德维被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等后殖民权威用英语翻译、介绍和理论化并获得印度文学最高成就奖,杰南皮特奖(Jnanpeeth Award)(纳尔逊·曼德拉曾是一次授奖仪式的特邀嘉宾),在获奖致辞中她肯定了译本在为她赢得孟加拉语(她的写作语言)之外的广大读者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她感激地提到的人不是斯皮瓦克或是她的其他英译者,而是阿文德·库马尔(Arvind Kumar),当时印度国家图书信托(National Book Trust of India)的主管,前印地语图书出版商。此人多年来一直推进她的作品在印地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的翻译和传播。共有两个马哈思维塔·德维。一个德维站在她的本土立场用母语演说政治和文化现状,就像在长期殖民和后殖民时期逐步形成的那样,就像从她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拉尼·拉克希米·巴伊(Rani Lakshmi Bai)是1857年“叛乱”期间反抗英国最为英勇的斗士之一,直到她的新作,讲述现今部落争斗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反抗独立印度的民族国家。另一个德维是几部精选短篇小说的作者,这些小说通过英译降生在西方学院设定的后殖民议程之内并被选举为其新的成员。还有很多个马哈思维塔·德维。在每一种印度语言中都有一个德维。她们的书写与后殖民议题的整个范畴交融,却因尚未被译成英语而不为后殖民话语所知。

这里的问题是:在被译成英语之前或未被译成英语之时一个人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后殖民的?他/她在被译出之前究竟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仅仅出于自我肯定的迫切渴求。自我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正在兴起的翻译浪潮。身处浪潮之中,每个印度人都肩负着把古代和现代的印度文学译成英语

[1]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8.

[2] H. Trivedi and M. Mukherjee (eds.), *Interrogating Post-colonialism: Theory, Text and Context*, Sh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96, p. 239.

的使命，从而展现给世界（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人）这些作品确实存在。拉马努金（A. K. Ramanujan）也许是印度独立半世纪以来最为出色的翻译家。他通过自己广博和谨慎的实践，就此做出表率。<sup>[1]</sup>

萨尔曼·拉什迪很可能是后殖民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首先用英语写作，因而也不需要被翻译。但这是因为他已通过变形把自己翻译成一位英语作家，变形的痕迹以印地语/乌尔都语词句的形式故意而透明地（或许对于大多数西方读者并不透明？）散布在他的作品之中。<sup>[2]</sup>这个神奇的双语性自相矛盾地将他认证为后殖民作家。另一层面的含义是，拉什迪宣称自己是一个“被翻译”的人，他提供的解释是他已经从印度/巴基斯坦到英格兰在肉体上被“跨越降生在世界上”<sup>[3]</sup>。同时抛弃他的母语和祖国的事实在他成为后殖民作家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建构角色。对于他和第三世界的很多其他作家来说，这种跨语言（translingual）、跨地域（translocational）的翻译（translation）是成为后殖民作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霍米巴巴的一个典型的同音公式专门针对拉什迪的小说列出：现在“国家之间的”（transnational）和“翻译的”（translational）在概念上几乎同义，而且曾经“无家可归的”移居者被翻译的混杂状态而今栖息在“第三空间”（Third Space）<sup>[4]</sup>——只有当一个人离开了第三世界他才可能进入第三空间。然而即使一个人坚定地置身于殖民大地，他仍然“在一个翻译的国度”，如特贾斯维尼·尼兰贾娜在她的殖民历史的复杂归并（complex conflation）中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辩称的那样；对于她来说，翻译是一个关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包罗万象的隐喻，用于界定被殖民者的生存状态。<sup>[5]</sup>定居在本国的殖民者和没有居所的流浪的后殖民者同样是被翻译者。

近期的理论论战中，说到后殖民翻译几乎少不了同义反复。在我们这个移居、流放、离散的（稳定物价的）时代，翻译这个词似乎转了一个圈，从它语言间的交易这个比喻性的文学意义回到它位置上的割裂这个词源学的物理意义；翻

[1]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114-140.

[2] Cf.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41-57.

[3] S.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Books, 1991, p. 17.

[4] H.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5, 224.

[5] T.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1992.

译本身似乎已经被译回了它的原本。如安德烈·勒非弗尔所说,“时间可能会这样超越那个词,比方说,把它提升到隐喻的高度,然后让它留在那里”<sup>[1]</sup>。

与此同时,翻译作为语言间交通的古老业务依然在过去和现在的被殖民世界中继续,比以往更为尖锐地反映着各种“本土语言”(vernacular)(即从语源学上讲奴隶的语言)和我们后殖民世界唯一的主人的语言(master-language)——英语——之间不均等的权力关系。当查尔斯·威尔金斯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这第一部从梵语译成英语的作品在1785年出版(琼斯的《沙恭达罗》是第二部),时任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评论说“这类作品会比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长寿得多”<sup>[2]</sup>。他该不会预知世界历史的后殖民转向,随之而来,《薄伽梵歌》而今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在英语翻译中反而比在原本语言中要更好地传播和保存——即使在印度本土几十年后也可能是如此。

### 3

以下探讨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径路。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在“后殖民书写和文学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文中指出,这两类文本作品惊人相似。二者均关注从一个文化元素到另一文化元素的传递机制。二者均受到重新定位过程的影响。因而如此多后殖民作家选择以隐喻的方式运用“翻译”这个术语并不令人惊讶。铁木志科着重探讨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等非洲作家常常使用的方式,即把非洲词汇嵌入他们的作品,从而在规范语言中产生变形,突出了文本的杂糅状态。她认为在翻译研究中常常存在的究竟是把观众带向文本还是把文本带向观众的区分在后殖民书写中同样存在。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后殖

[1] A. Lefevere, “Introductory comments II”, in *Cross Cultural Transfers: Warwick Working Papers in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Centre for British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1994, p. vii.

[2] J. L. Brockington, “Warren Hastings and Orientalism”, in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Papers from a Bicentenary Commemoration*, eds G. Carnall and C. Nichol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7.

民作家让读者面对差异这个现实，并质疑规范语言的至高无上地位。<sup>[1]</sup>

同样，普拉萨德 (G. J. V. Prasad) 从小说家拉贾·拉奥 (Raja Rao) 出发考察印度英语小说现状。拉贾·拉奥将写作行为视作印度文本、语境和英语的变形争取空间的努力。他指出印度英语作家没有将印度语言译成英语，而是运用不同策略让他们的作品听起来如同译文。这种故意将英语“稠化”或陌生化为阅读设置了障碍，却也宣示了印度作家随心所欲翻译语言的权力。一个翻译成果交织的网络和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开启；在那里双语状态成为常态。<sup>[2]</sup>

谢莉·西蒙在“接触区翻译和中介语创作：魁北克边境书写” (Translating and interlingual creation in the contact zone: border writing in Quebec) 一文中辩称，双语状态消解原本和译本间的二元对立。她使用玛丽·露易丝·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的“接触区” (contact zone) 概念指称原本相互独立的文化在这个地区合而为一。接触区传统上讲是文化在不平等条件下相遇之处，而今发展为一个重新自我定义、具有多样性、交流性、协商性和不连续性的空间。西蒙审视雅克·布洛尔特 (Jacques Brault)、尼可·布罗萨尔 (Nichole Brossard) 和丹尼尔·加侬 (Daniel Gagnon) 这三位魁北克作家的作品，以展现这些作家如何以激进的创造性方式演绎语言关系。她认为他们的作品故意地、自发地挑衅，模糊了文化身份的界线，反抗她称之为“对翻译工作彻底怀疑”的文化传统。西蒙还指出，从詹姆士·乔伊斯 (James Joyce) 和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到萨尔曼·拉什迪和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越来越多的作家断言他们在任何语言中都从未有“在家” (at home) 的感觉。当今世界，无论文化还是语言都无法为他们提供囊括所有参考书目的统一力量。西蒙表示，对翻译的当代理解既现实又不切实际，与不连续性、摩擦力和多样性更为相关。<sup>[3]</sup>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文章中采用了相似的论证思路。他提出“概念网格” (conceptual grid) 和“文本网格” (textual grid) 这两个巩固一切书写形式的概念。他认为这些网格难解难分地纠缠着，源自既定时代的文学文化习俗。比如史诗，一旦这个欧洲文化的伟大文学形式已然在事实上不复存在，而且对于当代读者

[1]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19-40.

[2]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41-57.

[3]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58-74.

来说变得陌生和疏离，那么任何企图翻译史诗的译者就算能意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形式对读者来说属于异类。相较而言，类似阿拉伯 *quasida*<sup>[1]</sup> 形式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没有先例，读者的抵制很可能卓有成效地完全阻止它的译出。勒菲弗尔辩称，译者需铭记在源文本系统和目标文本系统中概念网格和文本网格的双重设置，同时指出西方文化将非西方文化“翻译”进西方范畴，不顾一切强行施加了他们自己的网格。他以写于 1740 年至 1820 年间的三个荷兰文本作为例证：这些文本专门为荷兰读者构建了荷兰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产生于殖民语境之下，为了在宗主国消费。勒菲弗尔同时展现了这三位作家如何以不同方式运用形式强化他们对荷兰殖民探险的态度。<sup>[2]</sup>

埃尔斯·维埃拉在文章中论及巴西翻译家哈罗德·德·坎波斯，将我们从殖民主义史诗转移到 20 世纪食人主义事业。维埃拉强调德·坎波斯定义他所理解的新型后殖民翻译的大量隐喻：“翻创/创造性翻译”（Transcreation），“浮士德魔鬼变形”（葡 *Transluciferação Mefistofáustia*，英 *Mephistofaustian Transluciferation*），“光透视”（*Translumination*），“跨文本”（*Transtextualization*），甚至是“诗的重新配乐”（*Poetic Reorchestration*）和具有深远意义的“重新想象”（*Reimagination*）。德·坎波斯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理论一样激进，源于界定翻译的后殖民诗学的刻意企图。德·坎波斯说，翻译是一种故意拒绝重复现存原本的弑父行为。维埃拉审视 20 世纪巴西食人主义隐喻的重要性，并阐明德·坎波斯如何将食人主义展现为既是与单一（殖民）现实的决裂，又是一种形式的滋养。她认为翻译搅扰了直线交流和权力等级，并动摇了原始文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sup>[3]</sup>

翻译的搅扰力量同样是维奈·达沃克（*Vinay Dharwadker*）在文章中讨论拉马努金（*A. K. Ramanujan*）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他考察这位印度伟大翻译家的作品，展示拉马努金表述译者的任务是将外国读者“翻译”成本土读者这个观点，并辩称拉马努金的作品通过提供印度翻译诗学这一额外选项，卓有成效地证实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德里达（*Derrida*）翻译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文章第二部分，他为拉马努金辩护，力图表明他不是其他评

[1] 赞美诗、挽诗、讽喻诗或任何相关的文学形式。——译者注

[2]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75-94.

[3]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95-113.

论者所说的后殖民主义翻译家。<sup>[1]</sup>

对抗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模式的实例同样是罗斯玛丽·阿罗约 (Rosemary Arrojo) 论及海伦·西苏 (Hélène Cixous) 对克莱瑞思·黎思贝克特 (Clarice Lispector) 作品的翻译一文的主题。虽然知道西苏对黎思贝克特作品饱含真诚的激情,阿罗约辩称,这是西苏借用黎思贝克特的作品为自己服务的一个策略。如她所说,西苏对黎思贝克特的发掘已被理解为对传统的、殖民的、族长制的邂逅的一种逆转,带着欧洲作家对被殖民大陆女人的作品的爱慕。阿罗约表示,这种关系只会强化殖民模式,以西苏处于统治地位,故意忽视、摒弃甚至摧毁黎思贝克特自己的观点为结局。阿罗约认为西苏最终不过是重复了那个她宣称反对的男性族长制的压迫模式。<sup>[2]</sup>

伐那马勒·维什瓦那塔和谢莉·西蒙以不同的出发点在“变换交流基础”(Shifting grounds of exchange)这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中合作。她们指出,在她们各自的祖国印度和加拿大,翻译是一种极为敏感的文化张力的显示器。她们表示,翻译实践总是建立在一组以语言形态裹挟文化意义为方式的预设之上——简言之就是建立在含蓄的文化理论之上。后殖民视角衬托出不同文化间的不均等关系,其在文学文本翻译中也有例证。<sup>[3]</sup>

对于多语言国家及其担负的文化交流而言,理解译本传递的复杂性在现阶段非常重要,应是世界上无数人的准则。欧洲语言因曾是殖民主人的语言而一度被视为更优,而今其与数百种之前被边缘化或是被完全忽略的语言相互作用。翻译曾在殖民邂逅中处于中心地带,并被以各种方式运用于确立和维持某种文化相对另外文化的优越性。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跨文化文本传递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需要重新思考翻译历史和当代实践。食人主义曾是欧洲基督徒的绝对禁忌,而今被纳入视野,食人主义实践者的立场也忝列入翻译的途径了。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114-140.

[2]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141-161.

[3]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p. 162-181.

东方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思想积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如何应对世界格局巨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推动东方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成为中国东方学的责任担当。而“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倡议既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本刊即是旨在通过对东方国家文学及文化的创新性研究，梳理“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和地区之间由来已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探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东方民族在价值观、审美取向等方面的演变过程，从而为发掘东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建构东方文化的话语体系，为同在东方的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提供相应的参照和借鉴。

文学/文化/学术

ISBN 978-7-5649-2212-2



9 787564 922122 >

定价：58.00元